第 18 卷 第 4 期
1994 年 7 月

人口研究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18, No. 4
July, 1994

流迁人口研究

李若建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是很难严格区分开的，所以有人干脆用人口移动（Move）来包括上述两个概念。在中国，因为存在着严格的户口制度，由此产生了一批户口没有迁移，但人已经实际迁移的人口。笔者曾给这类人一个称呼："流迁人口"，以示这批人口界于有户口的迁移与流动人口之间，并且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全国[①]、上海[②]、福建[③]等地的流迁人口作了初步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中国的流迁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流迁人口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概念的界定与资料评估

流迁人口指的是没户口迁移而长期移动的人口。为了便于操作化，并且考虑到第三次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指标设置，本文把流迁人口具体定义为以下三类人口：

1. 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口（简称第 1 类流迁人口）。

2. 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口（简称第 2 类流迁人口）。

3. 有常住户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口（简称第三类流迁人口）。

1、2 两类人口，可合称为流迁入人口，第 3 类人口则为流迁出人口，三类人口统称为流迁人口。为了说明问题，本文把流迁人口的迁移率定义如下：

$$\text{迁入率}=\frac{\text{常住本地，离开户口登记一年以上人口（第 1、2 类流迁人口）}}{\text{常住本地，户口在本地人口}}$$

$$\text{迁出率}=\frac{\text{户口在本地，已外出一年以上人口（第 3 类流迁人口）}}{\text{常住本地，户口在本地人口}}$$

$$\text{净迁移率}=\text{迁入率}-\text{迁出率}$$

$$\text{总迁移率}=\text{迁出率}+\text{迁入率}$$

在人口过程的生、死、迁移三大要素中，人口迁移资料最难收集，其准确程度也比较不理想。与有户口的迁移人口比较，流迁人口的调查更加困难，其资料的准确性也差一些。虽然人口普查资料是研究流迁人口最好的资料，但是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按理说，第 1 类和第 2 类流迁人口之和应等于第 3 类流迁人口，也就是流迁入之和应等于第三类流迁出数，然而事实上资料并非如此。1982 年人口普查时，流迁入人口 657.5 万，流迁出 552.8 万，相差 104.7 万；1990 年人口普查时，流迁入 2135.4 万，流迁出 1719.5 万，相差 415.9 万，由此可见存在一定的误差。

造成误差的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流迁人口的调查难度大。除此之外，1982 年人口普查时，西藏未查 1、2、3 类流迁人口，1990 年人口普查时，西藏未查第 3 类流迁人口，这对流迁人口的准确性多少有些影响。还有，统计口径上的一些问题，恐怕也是因素之一。例如，1990 年深圳市符合人口普查登记条件的外来人口 102.3 万，不符合人口普查登记条件的外来人口 28.2 万[④]，后者相当于前者的 27.6%，东莞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有 41.7 万外来劳动力，而常规劳动统计则显示同年底有 65.6 万外来劳动力，后者比前者高 57.3%[⑤]。

由此可见，人口普查的流迁人口资料存在一些缺陷，至于误差多大，尚难估计。但可以肯定，实际上中

国的人口流迁状况，要高于人口普查资料数。虽然有一些不足，人口普查资料仍是目前最好的人口资料，因此，本文依据人口普查资料作分析研究。

二、1982—1990年流迁人口变迁与分布

1982—1990年间，中国社会与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伴随着这场变革而来的是空前的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在这场变革中，旧的户口制度依旧对人口迁移有制约作用，但是，不要户口的流迁人口则不受控制，其数量急剧上升。1982年全国流迁入人口657.5万，而1990年全国流迁入人口达2135.4万，平均每年递增15.86%，这一速度高于同期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1982—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9.51%[®]）。

流迁人口的增长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除西藏缺资料外，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流迁人口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在局部地区，流迁人口增长的速度惊人。例如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1982年只有11.5万人口是属于流迁入人口，1990年这一数字是278.4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48.9%。从整体看，流迁人口的多少与流向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差异与城乡之间的差异。

首先看东、中、西三个地带的情况。表1和表2分别表示各地带流迁人口数量与迁移率，表2并对迁出率作了相应调整，以使全国人口迁入与迁出总量能够相等。从表1与表2的情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表1　　1982—1990年各地带流迁人口数量分布

地区	流迁入人口					流迁出人口				
	1982年		1990年		流迁入人口增长(%)	1982年		1990年		流迁出人口增长(%)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东部	2 673	40.6	10 503	49.2	292.9	2 599	47.8	8 684	50.5	234.1
中部	2 747	41.8	6 983	32.7	154.2	1 787	32.3	4 999	29.1	197.7
西部	1 155	17.6	3 868	18.1	239.4	1 142	20.7	3 512	20.4	207.5
全国	6 575	100.0	21 354	100.0	224.8	5 528	100.0	17 195	100.0	211.1

说明：1982年无西藏资料，1990年无西藏流迁出人口资料。

资料来源：(1)《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二）》

(2)《中国人口年鉴1992》

表2　　1982—1990年各地带流迁人口迁移率　　‰

地区	1982年迁移率					1990年迁移率				
	迁入率	迁出率	修正迁出率	净迁移率	总迁移率	迁入率	迁出率	修正迁出率	净迁移率	总迁移率
东部	6.55	6.36	7.56	−1.01	14.11	23.16	19.15	23.78	−0.62	46.94
中部	7.75	5.04	6.00	1.75	13.75	17.72	12.69	15.76	1.96	33.48
西部	5.07	5.01	5.96	−0.89	11.03	15.28	13.87	17.23	−1.95	32.51
全国	6.64	5.58	6.64	0	13.28	19.40	15.62	19.40	0	38.80

说明：修正迁出率$=\frac{\text{全国迁入率}}{\text{全国迁出率}}\times$各地迁出率

净迁移率＝迁入率－修正迁出率；总迁移率＝迁入率＋修正迁出率

资料来源：同表1

第一，中国大多数的流迁人口均进入或出自东地带，无论是1982年还是1990年东部地带的总迁移率均位居榜首。除此之外，东部地带流迁与流迁的人口增长速度均为全国最高的。事实上，东部一些地区，流迁人口迁移率为全国最高的，1990年流迁人口总迁移率最高的10个地区中，6个在东部地带。东部不少地区人口是大进大出，如1990年广东省有流迁入人口329万，而流迁出人口257.6万（大部分在省内流动），流迁人口总量居全国之首。

第二，从表2可知，1982年与1990年，中部地带的流迁人口净迁移率均为正值。位于中部地带的山区

和内蒙、黑龙江和吉林等省、自治区，一直是传统的人口迁入地，特别是这几省的煤矿与林区，一直吸引着大批外来人口，中部地带依旧是中国流迁人口的主要流迁入区。例如，1990 年山西大同区流迁入人口达 17.7 万，流迁人口净迁率高达 153.3%，居于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100 万之间的城市）之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部地带一些地区，其户籍人口的迁移是净迁出，而流迁人口则为净迁入，最为典型的是黑龙江省。1982 年黑龙江流迁入人口 33.6 万，1990 年为 44.5 万，而 1981—1989 年间，黑龙江有户籍的迁移人口是净迁出 49.9 万[⑦]。这一矛盾现象说明，有户籍的迁移，与人口流迁在性质上有一定区别，这点将在后面进一步分析。

第三，西部地带无论是从流迁人口的总量来看，还是从净流迁人口的情况来看，都是全国最弱的地区，也就是西部的人口流动性偏弱。不过在 1982—1990 年间，西部地带流迁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加快，西部与中部地带的流迁人口的总迁移率差别缩小。1982 年中部地带流迁人口总迁移率比西部地带高出 24.7%，1990 年则仅高出 3.0%。要说明的是，在西部地带，除去四川省外，其余地区均是人口净迁入区，1982 年西部地带除四川外净流迁入 29 万人，1990 年净流入 90 万人。相反，四川省在 1982 年净流迁出 33 万，1990 年净迁出 98 万。

表 3　　1982—1990 年城乡流迁人口数量分布

城乡类别	流迁入人口					流迁出人口				
	1982 年		1990 年		流迁入人口增长(%)	1982 年		1990 年		流迁出人口增长(%)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人数(千)	占全国(%)	
特大城市	1 118	17.0	4 487	21.0	301.3	325	5.9	598	3.5	84.0
大城市	597	9.1	1 986	8.9	219.3	129	2.3	225	1.3	74.4
中等城市	777	11.8	4 199	19.7	440.4	279	5.8	942	5.5	237.6
小城市及县	4 083	62.1	10 762	50.4	163.6	4 795	86.8	15 430	89.7	221.8
其中：										
小城市	343	5.2	2 782	13.0		137	2.5	2 095	12.2	
县	3 748	52.9	7 980	37.4		4 658	84.3	13 335	77.5	
全国	6 575	100.0	21 354	100.0	224.8	5 528	100.0	17 195	100.0	211.1

说明：(1) 城市人口规模以 1990 年非农业人口为标准划分：特大城市 100 万以上，大城市 50—100 万，中等城市 20—50 万，小城市 20 万；(2) 市不包含辖县；(3) 因为 1982—1990 年间许多县升为小城市，所以必须将县与小城市合并方可比。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4　　1982—1990 年城乡流迁人口迁移率　　‰

城乡类别	1982 年迁移率					1990 年迁移率				
	迁入率	迁出率	修正迁出率	净迁移率	总迁移率	迁入率	迁出率	修正迁出率	净迁移率	总迁移率
特大城市	22.99	6.68	7.95	15.04	30.94	58.61	7.81	9.70	48.91	68.31
大城市	29.66	6.41	7.63	22.03	37.29	78.49	9.27	11.51	66.98	90.00
中等城市	19.83	7.12	8.47	11.36	28.30	53.88	12.09	15.02	38.86	68.90
小城市及县	4.52	5.31	6.32	−1.80	10.84	11.67	16.74	20.79	−9.12	32.46
其中：										
小城市	2.17	1.21	1.44	0.73	3.61	20.61	15.52	19.28	1.33	39.89
县	4.31	5.37	6.39	−2.08	10.70	10.14	16.94	21.04	−10.90	31.18
全国	6.64	5.58	6.64	0	13.28	19.40	15.62	19.40	0	38.80

说明：同表 1、表 2、表 3。

资料来源：同表 1

流迁人口在空间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带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城乡之间，表 3 与表 4 中的数据说明城

乡之间流迁人口有如下若干特征：

第一，流迁人口主要出自农村、小城镇和小城市。1982年流迁出的人口86.8%出自县与小城市，199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89.7%。

第二，流迁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流入大中城市，并且流入大中城市的比重迅速增加。1982年流迁入的人口中，39.9%的人进入特大、大中城市，而199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49.6%。

第三，大部分的流迁人口的迁出地与迁入地是县与小城市，表明农村及小城市镇有许多流迁人口存在，没有户口的迁移，依旧是农民迁移的重要方式。

第四，无论是总迁移率还是净迁移率，均表现出“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这么一个从高到低的等级序列。在这个序列中，除了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顺序有错位外，基本上反映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层次越高，人口流动越频繁，也越吸引人。1990年与1982年相比，各类聚落之间流迁人口的迁移率差距明显加大。

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少大城市似乎有不少流迁人口进入，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流迁人口聚集在市郊，特别是城乡结合部。例如北京市流迁入的人口中，77%集中在近郊的6个市辖区。广州市的流迁入人口中，30.7%集中在市辖郊区的镇中，27.4%集中在4个郊区的街道，两者合计为58.1%，表明大部分流迁入人口并未进入市中心区。

综上所述，1982—1990流迁人口变化大体上可归纳为：基本格局不变，依旧是经济发达地区流迁活跃，不少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不过流迁人口绝对数量大幅度上升。

三、流迁人口的个人特征与迁移动机

目前尚未见全国性有关流迁人口的特征的人口资料公布。幸好，广东与浙江两省分别将该省的流迁入与流迁出人口资料整理公布，1990年广东省流迁入人口为329万，是流迁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占全国流迁入人口的15.4%。同年浙江省流迁出人口142万，人数仅次于广东与四川两省，占全国流迁出人口的8.3%。可见这两省的资料有一定代表性。

流迁人口的一个特征是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特别是中青年人占绝大多数（见表5）。广东与浙江两省的流迁人口中，80%左右的人的年龄在15—44岁间。流迁人口的另一个特征是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体，文盲与大学文化人口的流迁相对少一些（见表6）。与全省人口的教育程度相比，流迁人口无疑是文化素养比较优秀的一群人。

表5　　广东与浙江流迁人口年龄构成　　%

年　龄	广东流迁入人口	浙江流迁出人口
0—14	10.3	15.5
15—29	68.2	51.2
30—44	14.6	23.3
45—59	4.2	6.4
≥60	2.7	3.6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1)《广东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资料》

(2)《浙江统计年鉴1992》

一般来说，人口迁移以年青人为主，是因为青年比较富有冒险精神，并且适应性比较强。流迁人口相当一部分是从事重体力与熟练工作，这些工作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流迁人口以青年人为主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证实，文化程度高的人，往往迁移距离较长远[®]。目前中国的许多流迁人口都是长距离迁移，如浙江流迁出人口54.9%是出省的流迁，而广东流迁入人口约三分之一来自外省。长距离迁移，需要更高的素质

才能谋生与发展，这或许是流迁人口教育程度高于迁入地或迁出地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的原因之一。

表6　　广东与浙江流迁人口（6岁以上）每千人中各种教育程度人数

教育程度	广东		浙江	
	流迁入人口	全省人口	流迁出人口	全省人口
大学(含大专)	15	15	6	13
高中(含中专)	130	103	77	77
初中	507	265	362	261
小学	294	466	438	436
合计	946	849	883	787

资料来源：(1)《广东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资料》

(2)《中国人口年鉴1992》

经济因素，历来是人口迁移最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动机同样是流迁人口最主要的迁移动机。在广东的流迁入人口中，81.5%是在业人口，如果只考虑劳动龄人口（男16—60岁，女16—55岁）的话，广东流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92.9%是在业的，可见经济动机，特别是找职业谋生是流迁人口的迁移动机。另外，在浙江省流迁出人口中，67.7%是从事社会经济活动，随亲外迁占20.2%，其他占12.1%[⑧]。

四、人口流迁的成因探讨

从流迁者本人来说，其动机主要是经济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婚姻、学习等非完全经济因素，不过要探讨流迁人口的成因就不能不从更深层和更广阔的背景去探讨。对此，可以从当前中国人口流迁、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体系三个层次去探索。

为经济利益所驱动而产生迁移的欲望是一种近乎于永恒的欲望，然而并非欲望都会产生迁移，大规模迁移的产生需要一个适合的社会环境。显然，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有了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这是导致大批流迁人口产生的原因。不过，当代中国历史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曾产生过大规模的流迁，最为突出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农民外流，据载1958—1960年流入江西35万人左右[⑩]。1957—1960年内蒙古安置自流人口87.3万，1958—1960年黑龙江安置自流人口35.6万，而一些省份则人口大批外流，河南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外流高达120万人，甘肃省在1959年和1962两年外流10万多人[⑪]。

近年中国人口流迁与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有本质区别，而我们要作的是揭示这种区别。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应归因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当前的大规模人口流迁则是由于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泽林斯基提出的人口迁移转变论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口迁移的流向都有不同，在工业革命初期，现代化从变革的中心向外扩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农村之间也有许多人口迁移，同时还有大批的国际迁移及循环迁移（流动），不过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少[⑫]。目前中国流迁人口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泽林斯基的归纳，只是中国不能说是处于工业革命初期发展阶段罢了。虽然中国并不处于工业革命初期，但是有许多特征与工业革命初期类似，例如，现代化的地区大多数位于城镇，广大农村仍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可以说许多农村仍未达到工业革命初期的发展水平。城乡之间的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加深，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近似于工业革命初期的情况。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口流迁，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社会结构是导致中国产生大量人口流迁（包括困难时期与现在）的直接宏观因素。笔者曾把影响农村的外流结构性因素归纳为：1. 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驰；2. 农民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3. 宏观经济的波动[⑬]。因为流迁人口以农民为主，如1990年广东流迁人口的85.3%是农业户口，所以上述结论对流迁人口也适用。

结构因素对流迁人口的影响还可列举许多，比较突出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一些来料加工工业发达的地

区，有大量的外来劳工聚集[9]，甚至在局部地区，流迁人口超过当地人口。

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价值观念体系是影响人口流迁的重要原因。1990年浙江省有142万人流迁出户口所在地，这一现象与该地的文化传统相关。浙江并非一个穷省，1990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1 044元，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的农民，居全国第四位。浙江农民之所以外流，其目的在于谋取更高的收入。1990年浙江沿海开放市县流迁出人口达81万，占全省流迁出人口的57.1%，流迁人口的迁出率高达31.7‰。类似浙江的情况在福建也存在。1990年福建沿海开放市县流迁出52万人，占全省流出人口的76.9%，流迁人口的迁出率高达28.4‰。浙江、福建两省的沿海是这两省比较富裕的地区，这些地区人口外流，说明这类地区长期存在的移民传统，对人口流迁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与闽浙两省沿海地区相反，一些贫困地区并没有多少人口向外流迁。贵州省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之一，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元，居全国倒数第二位，但是1990年该省流迁人口迁出率只有9.8‰。甘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倒数第一，但是该省1990年流迁只有8.8‰。特别要指出的是，贵州与甘肃都是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地区，而贫困县的人口流迁率并不高。例如，贵州的国家扶贫县流迁出人口只有7万人，流迁人口迁出率只有8.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样，在甘肃的国家扶贫县只有8万流迁出的人口，流迁人口迁出率只有8.7‰，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贵州与甘肃两省的情况，正好说明价值观念的差异会对迁移产生影响。某些地区移民谋生是一种习俗，而某些地区则安土重迁，安于贫困的生活。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人口流迁。例如，户口政策使一些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人口上不了户口，浙江的流迁出人口中，婚嫁的近6万人，占4.0%，由此可见户口政策的影响。

注释：

①李若建．中国人口的流迁．《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带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李若建．上海市人口流迁初探．人口，1987；1

③李若建．福建人口流迁研究．福建人口，1987；1

④深圳市人口普查办．《深圳市人口普查分析文集》

⑤《东莞统计年鉴》1978—1990

⑥《中国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⑦《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⑧李若建．人口社会学基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84—185

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2》．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⑩沈益民．中国人口迁移．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196

⑪《中国人口丛书》内蒙古、黑龙江、河南、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⑫L. A. Kosinski. People on the Move. Haper，1975：10

⑬李若建．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学研究，1991（5）

⑭李若建．广东人口流迁研究．广东人口情报，1992（4）